

本地人与外来者：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一探

李里峰

内容提要 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分野,是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的一个重要侧面。外来干部多系上级组织委派或从异地调入,一般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本地干部的整体文化素养较低,却因其地方性知识而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性。党组织为缓和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间的矛盾、克服“宗派主义”和“包办代替”的弊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始终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这反映了地缘因素对于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本地干部 外来干部 干部地方化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逐渐摆脱生存困境,不断发展壮大,党员和干部队伍的规模空前扩张、素质整体提升,为1949年最终赢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依赖和重视程度远远超出现代西方政党,可以说,一个庞大、忠诚、高效的干部群体,是中共组织得以运转、革命得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①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共干部群体及其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尤以黄道炫最近发表的《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最为引人注目。该文以抗战初期加入中共的“三八干部”为中心,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举措,将大批干部培养成具备革命气质、符合组织要求的政治精英,为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新视点。^②

考虑到中共干部群体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相关研究成果还留下了不少待发之覆。例如,被笼统称作“干部”的群体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类型都有大致可以识别的身份特征和思维方式,在中共组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亦自有别:从阶级身份来看,可以分为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从干部籍贯来看,可以分为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根据是否脱离生产、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可以分为脱产干部和不

^① 张闻天称,所谓干部,是指“在党的各方面工作中担负着一定的负责任任务的党员”。见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页。党内文件提及“党的干部”或“党员干部”时,常有不同的所指(但在使用上往往不作明确区分):或指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承担管理工作的人,或指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全体工作人员,还可以指在抗日民主政权及群众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

^② 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脱产干部；根据入党时间和任职时间的长短，形成了新干部和老干部之别；根据从事工作的性质，又有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区分。黄文中已经提到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差异，指出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大量提拔和改造，是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养成的重要途径。然而，对其他复杂情形的考察还相对欠缺。本文拟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对基于干部籍贯而形成的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分野，作一粗浅探讨。

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

中共领导人关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论述，最有名的要算毛泽东1944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讨论党内宗派问题时指出，陕北的外来干部大多是来自南方省份的军队干部，其中许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仅有2万多人，抗战爆发后发展的新党员、新干部绝大多数是陕北本地人，当时的延属地委除王震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本地干部，西北局及华北、华中各地区也以北方干部居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往往强调军队的重要性，本地干部则更重视地方党政的常规力量，致使“山头主义”成了“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① 陕北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干部的地缘结构自然有其特殊性，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则是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区分干部类型的各种维度中，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别的性质有所不同。区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依据的是干部自身的阶级成分，一般说来比较稳定；而区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则取决于干部籍贯与其工作地域是否一致，具有相对性和灵活性。一则，所谓“本地”与“外来”的不同标准（本省、本区、本县、本分区还是本村）会影响干部类型的确认；二则，频繁的工作调动也会随时改变干部的本地或外来身份。但是从各级党内文件来看，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往往仍被视为各有其特征的“同质化”群体。在上级组织和领导人眼中，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理论水平的高低和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两个方面：外来干部多系上级组织委派或从其他地区调入，一般说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但本地出生成长的干部，在语言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外来者无法比拟的优势。^② 由于抗战期间大量发展知识分子党员、提拔知识分子干部，上级委派或外地调入者以知识分子干部居多，所以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别，又时常和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分野有所重叠。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干部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甚至险恶，了解当地情况、融入当地社会，便成为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这时候，“地理熟，社会关系多，易与群众打成一片，在环境恶化时容易隐蔽坚持工作”的当地干部就显得极为重要了。^③ 山东省党组织创建的早期阶段，外来干部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的情形已经引起了党组织的重视。据报告，1930年山东省委的三名常委都是外省人，到山东省工作的时间又都不长，对本地工作相当隔阂，只有一人能够出外巡视，另二人则因言语关系难以胜任。^④ 1932年10月的一份文件提到，主持青岛工作的李俊德因为语言不通、居住不便而无法亲自去做沧口的工作，致使该地工作长期难以深入。^⑤ 同年11月山东临时省委给中央报告

① 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3月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1页。

② 《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7-01-0020-001。

③ 《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7-01-0020-001。

④ 《省委常委张若臣关于山东党组织状况的报告》（1930年7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

⑤ 《李俊德对青岛和山东工作的意见》（1932年10月1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中的一段话，更生动地反映了外来干部在工作上的窘境：

明、廖在此，言语上都成问题，尤其是廖，简直无法和外县农民同志谈话，并且易引起人们注意，加以怀疑。当他参加面粉厂支会时，被巡警发现，几乎被捕，一则因为他们择地方也太不小心。再讨厌不过的就是不容易解决住的问题。几个本地人都是光杆，又找不到铺保，不易租到房子，就租到手也不稳固，外方口音更是少办法，现在正设法找本地女同志，但殊难。……多几个外省人，不符环境，又不熟悉下面情形，无甚意义，所以化南已经要他去青岛了。^①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春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倾向”，明确提出加强和扩大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②此后直到1939年8月转入“巩固的发展”阶段，这一年多时间堪称中共组织发展的鼎盛时期，各根据地党员和干部人数增长极为迅速。尽管山东党组织在“大发展”阶段吸收的党员、提拔的干部绝大多数为山东本省人^③，但因省内不同地区的语言、文化、风俗差异甚大，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分野仍给各级党组织带来了很大困扰，所谓“干部地方化”仍是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央领导人和山东省委多次强调，“每个地方要采取使干部地方化的方针”^④，这是“坚持工作、克服困难的最好办法”^⑤；“在整个山东，应提拔本地干部，培养本地领袖，这对山东抗战与党的工作有极重大意义”。^⑥与党组织的要求相一致，各级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分别提出干部地方化的口号，如1940年一份文件提出县以下的青年团体干部也须“尽量地方化”的要求。^⑦根据党内文件中的用法，所谓“干部地方化”主要是指培养、提拔地方干部，提高本地干部在干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它的另一层意思则是针对外来干部而言的，要求外来干部尽可能地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社会环境，完全融入当地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去。^⑧

也有一些文件提到干部地方化带来的弊端，主要是本地干部多为农民出身，以务农为业，恋家恋乡的观念十分强烈，时常因为农业生产或其他事情而耽误工作，农忙时期更是如此。许多脱产的分区级以上本地干部，还会离开工作岗位径自回家，领导和上级机关甚至难以将其召回。^⑨但总的说来，在形势险恶的战争年代，地方干部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要远远超出这种负面影响。关于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特性和作用，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黎玉说得很透彻：“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自然联系的干部，是顶顶重要的干部”，新开辟的地区自然需要派遣一批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当然属于外来干部），但只能是核心骨干的配备，“应发挥一种接生婆和教员的作用，通过他来产生和培养大批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⑩

① 《鲁临省委负责人任作民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11月19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第93—94页。

② 《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66—468页。

③ 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党员群体的社会构成，参见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

④ 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06页。

⑤ 《山东的农民工作——1940年8月12日郭英在联合大会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⑥ 《中央关于胶东工作的指示》（1939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⑦ 《抗战以来山东青年运动的总结及其发展的新方向》（1940年8月1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5辑，第204页。

⑧ 中共山东分局委员会：《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1943年8月19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

⑨ 《鲁中区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7-01-0020-001。

⑩ 黎玉：《加速建设新地区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1944年9月10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二、干部籍贯分布的层级差异

查阅抗战时期党的各级组织工作报告,关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特性及相互关系的论述随处可见,但某地区究竟有多少本地干部、多少外来干部,能够找到的统计数据资料却十分零散。1931年初,山东全省有籍贯统计的27名主要工作人员中,来自本省者为20人,外省为7人。^①这大概反映了中共党组织初建时期的情形。抗战时期,由于山东根据地是唯一以全省规模形成的抗日根据地,具有很强的独立性^②,所以干部大多在省内不同地区之间流动,而较少与周边省份发生关系。所以和其他根据地相比,山东根据地的外省干部数量是比较少的。^③事实上,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差别,在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中、高层组织里,整体而言干部的文化水平较高,适应能力较强,流动性也较大,因而其阶级身份和工作能力上的差异往往比地缘身份即籍贯的区分更为重要。

以下是笔者搜集到的关于山东省干部籍贯的几组统计数据,虽然范围十分有限,或可一窥此时期中共干部地缘结构之一斑。^④

其一,1943年12月鲁南区部分干部籍贯统计。180名鲁南区委干部中,来自鲁南本区者109人,外来者71人;42名地委干部中,来自本地委者11人,外来者31人;230名县委或县工委干部中,来自本县者110人,外来者120人;568名分区委干部中,来自本分区者224人,外来者344人。总计1020名干部中,本地干部有454名,占总数的44.5%;外来干部566名,占总数的55.5%。^⑤

其二,1945年2月平北县干部籍贯统计。(1)县级干部。县委委员9人中,本地1人,外地8人。县级各部门各团体干部中,党务工作干部13人,本地4人,外地9人;政府工作干部51人,本地11人,外地40人;大队连级以上干部8人(均为党员),本地1人,外地7人;群众团体干部13人(其中党员9人),本地6人,外地7人。县级机关干事以上干部共计85人(其中党员51人),本地22人,外地63人。(2)分区干部。分区委员33人中,本地17人,外地16人。分区级各部门各团体干部中,党务工作干部39人,本地25人,外地14人;政府工作干部51人(其中党员40人),本地39人,外地12人;群众团体干部88人(其中党员79人),本地63人,外地25人。^⑥

其三,1945年五龙县干部籍贯统计。(1)县级干部。县委委员13人中,本地8人,外地5人;政府干部139人中,本地49人,外地90人;武装部干部11人中,本地6人,外地5人;各救会(“各界救国联合会”之简称)干部11人中,本地5人,外地6人。县级干部共计174人,其中本县68人,外地106人。(2)分区干部。分区委员49人中,本地35人,外地14人;区公所干部88人中,本地69人,外地19人;武装部干部49人中,本地44人,外地5人;各救会干部84人中,本地70人,外地14人。分区干部共计270人,其中本地218人,外地52人。218名本地干部中,有139人来自本分区、79人来自本县其他分区。^⑦

① 《山东省党组织状况一览表》(1931年2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第350页。

② 参见王东溟《论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全省规模形成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1944年11月),即专门谈到这一点,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第172页。

④ 关于以下统计有两点说明:(1)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体系大致包括六个层级:分局—区委—地委—县委(或县工委)—一分区委—支部(或特别小组)。参见王海天主编《中共山东省组织发展史概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6页。(2)所谓“本地”与“外来”,皆就统计之层级而言,例如县级干部的统计数字,本地干部即指籍贯为本县的干部,外来干部则指籍贯为本县以外的干部,其他层级亦然。

⑤ 《鲁南区党委组织状况调查统计表》(1943年1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8-01-0011-001。

⑥ 《平北县委组织科一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5年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4-01-0208-003。

⑦ 《五龙县一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G024-01-0208-005。

上述第一组数据所反映的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比例比较接近,且没有显著的层级差异。但根据平北、五龙两县的统计,可以清楚看到县级干部中的外来者比例远远高于区级干部。在县一级,平北县无论党务还是行政、军事、群众干部,外来人员都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五龙县政府干部中的外来者明显高于本地人,其他类型干部中的本地人与外来者大致相当。而在分区一级,绝大多数干部都来自本分区或者本县。将党、政、军、民各部门的情形分开来看,县级机关的差别不大,分区级则政府、军事部门及群众团体中的本地干部比例高于党务部门,这也和党务干部流动性更强的特点相吻合。根据这些数据大致推断,干部籍贯分布的确是存在层级差异的,组织层级越高,外来者在干部总数中所占比重越大;层级越低,尤其是到了分区层级,本地干部所占比重明显提升,基层支部的党员、干部则大体上全都来自本乡本村。^①

不过,在分析这些统计数字时应该注意到,在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根据地干部的流动性很强,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之间的调动和转化非常频繁,各种工作报告和总结中关于干部籍贯的统计往往比较随意、粗糙,很难根据个别、零散的数据来概括其全貌。以胶东区为例,根据1942年的材料,属于新开辟地区的北招县,县级干部中除县委书记外,大部分是外地人(其中一部分是邻近的南招县人),分区级干部统计除南招、掖县人外也很少有当地人。^②组织发展历史较久的东栖县则基本实现了“干部地方化”,除工作需要或有其他问题而不能在本地方工作者之外,皆以地方化为原则分配各分区党政军民干部,只有极少数(如九分区的工、妇主任)不是本地人。^③1943年的一份文件提到胶东大部分地区的县以下干部都实现了地方化,但同时又认为三年来分区以上干部伤亡187名,“其原因主要是干部不地方化所致”,因为他们“地方情况不了解,风俗人情不熟悉,语言不合,生活不同,环境艰苦,最易遭受逮捕与牺牲”。^④这些材料,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干部地缘结构的准确信息,不如说是揭示了战时情形的异常复杂。

三、“宗派主义”与“包办代替”

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在开展各项工作时也时常发生分歧和冲突,有时甚至会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成为高层领导人极力批评的“宗派主义”或“山头主义”的造因。这样的情形在山东中共党组织发展初期就曾出现过:“×同志刚到泰安,他们就认为是吃他们的饭,来剥削他们,遭了他们的反对。其理由是泰安工作少,不需要派人。经过×同志向他们作了严厉的斗争,才克服了他们的错误观念,容留了×同志在泰负责工作。”^⑤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明确指出,党内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相互歧视:地方干部看不到外来干部文化水平高、原则性、组织性、条理性、工作方式灵活等优点,只看到他们趾高气扬、不切实际、爱提意见、不易领导等缺点。反之,外来干部也看不到地方干部与群众联系紧密、埋头苦干、切实朴素等优点,只看到他们“土包子”、能力不够、不懂理论、不会讲话等缺点。^⑥

朱瑞是从干部自身特质来分析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分歧的,事实上,两类干部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冲突,更与党组织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和不同预期密切相关。尽管高层领导人一再强调“干部

① 参见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章。

② 胶东区第二地委:《三个月组织工作总结报告(1942.10—12)》,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4-01-0205-001。

③ 《东栖县组织工作报告》(1942年),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4-01-0208-006。

④ 《抗战五年胶东党的组织建设》(1943年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4-01-0256-001。

⑤ 《泰安中心县委工作概要》(1932年7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第68页。

⑥ 朱瑞:《群众工作的领导问题》(1942年7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页。

“地方化”的重要性,但外来干部主要来自上级委派或异地调入,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信任,往往肩负着指导甚或改造下级组织的使命。从各级组织工作报告来看,巡视制度和工作团、组制度在抗战时期十分盛行,许多外来干部正是作为工作团、工作组成员被派往下级组织或下级机关指导工作的,其中一部分人后来便长期留在当地工作。

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组织发展方针从“大量发展”转变为“巩固的发展”后,各根据地党组织经常会把机关干部派到基层指导“整理支部”工作。不难想象,上级派来的这些“整支干部”与作为整顿对象的当地干部之间,难免会有分歧和龃龉。1943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对整支干部提出了如下要求:“必须真正参加各该支部内去工作,并与党员生活、学习、工作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且成为他们共同敬重信仰的党员,莫突出,莫特殊,要细心,要耐心,尤其注意站稳立场,坚持党性,不要卷入党员中的好恶偏向和感情的关系中,这不但不能整理支部,且将陷入农村党员中可能存在的宗派斗争中去。”^①其中提到的不良情形,显然正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亲切随和的性格和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些外地干部很难赢得当地干部信任、顺利开展工作。

如果说“宗派主义”的批评多数情况下是针对地方干部拒斥外来干部而言,党内文件中对外来整支干部最常见的批评则是“包办代替”,指责他们以“上级委派”自居,轻视地方干部,甚至越俎代庖,完全取代了支部的领导。山东分局的一份整支工作总结,详细描述了整支干部是如何干涉和取代支部领导的:

在过去分区对支部的领导,如目前整支干部对支部的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包办代替现象。如代替支干,主持支委会,把支委作为附属品,五六个干部都参加支委会,你讲一套,我讲一套,使支委觉得没话说或不敢说话;又如无论召开支干会或小组会,不与支干、小组长商量,自己决定后支配支干、小组长召集,不从共同商讨中发挥他们的自动性;公开场合由整支干部代替支干亲自主持会议,不去培养他们的威信和工作能力,不通过小组会、支委会共同商讨党员群众问题,以培养教育支干,而是个人独断独行。^②

鲁中区党委一份组织工作报告也提到类似的情形:整支干部到支部去摆架子,不了解情况,支部党员也发生应付和欺骗现象;整支干部态度生硬不民主,对支部党员意见采纳不够,有的支部半数以上的党员反对上级清洗某党员,而整支干部不予考虑,反而“批评支部同志包庇,以纪律制止党员发言”,导致支部关系僵化,严重影响了整支的成效。^③

和毛泽东所描述的陕北地区相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同样存在严重的“不团结和宗派主义”,这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关系的另一个侧面。抗战初期党组织的发展是以抗日武装为主要载体进行的,军队干部在党内的地位很高;但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各种群众运动和日常党务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中共中央1939年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努力发展地方党”,“提拔山东本地干部和群众领袖到各级领导机关中来”。^④部队工作与地方工作,在工作性质、制度、形式、作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两种工作、两类干部发生交集之时,难免相互瞧不

^①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决定》(1943年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

^② 《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半年来整支中几个主要经验的总结》(1943年8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第211—212页。

^③ 《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7-01-0020-001。

^④ 《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第71页。

起、相互埋怨：军队认为地方干部拖拉迟缓，松懈散漫，认为在战争年代军队工作具有至高的地位；地方则认为军队干部太紧张、太性急，对军队中“特别突出的战斗性质和集中性质”不以为然。双方都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场，强调自己的特殊性、重要性，很难相互理解，工作上的配合帮助“更谈不上”。^①

对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上级党组织的态度颇为复杂。一般说来，外来干部与上级组织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也迫使各级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向本地干部妥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曾明确规定，为团结全党干部，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② 中共山东分局也多次强调，应大胆地信任与大量地使用地方干部，引进有实际经验、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到党的领导工作中来。^③ 然而，在主要由上级组织发起的“锄奸”“肃反”等党内清洗运动中，外来干部通常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地方干部则往往成为怀疑和清洗的对象，不被上级信任，遭受不公正待遇。在单纯依靠口供定案的锄奸或肃反扩大化时期，情形更是如此。^④

小 结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一个从中央到支部的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是将其凝聚起来的基本精神力量。在理想状态下，党员和干部的血缘、地缘、业缘等身份应该被基于党内科层制的组织层级和工作关系所取代。但是大量党内文件表明，党员、干部的地缘身份在党的组织发展和各项工作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干部籍贯而形成的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分野，也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始终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这表征了中国革命的极度复杂性。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进行革命动员时，对家族、宗族、乡邻等血缘和地缘关系进行了有意识、有成效的利用。^⑤ 这些传统型社会关系长期被视为革命的阻力，其实完全可能，事实上也确实成为革命的助力。^⑥ 如论者所说，中国共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地方革命”^⑦，其最终成功是在统一的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框架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果。^⑧ 就此而言，抗战时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不同特征及其分歧和冲突，既反映了地缘因素对于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艰难努力。

〔作者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胶东军区组织工作总结》（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G050-01-0012-003。

②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

③ 《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1942年10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85页。

④ 参见《中央社会部对山东锄奸工作与党内反奸细斗争的意见》（1941年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蒋秋纬对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肃反运动的研究也表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矛盾确实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本地干部往往成为主要的受害者。参见蒋秋纬《以本地干部为主要对象的肃反斗争——以鄂豫皖苏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2001年。

⑤ 参见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

⑥ 参见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1—97页。

⑦ Tony Saich,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 Area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ember 1994), p. 1006.

⑧ 参见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